



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丛书

ZHOUQIN LUNLI WENHUA YANJIU CONGSHU

德性之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崔丽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丛书

ZHOUQIN LUNLI WENHUA YANJIU CONGSHU

德性之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崔丽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崔丽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7587 - 3

I. ①德… II. ①崔… III. ①儒家—学派—哲学思想—研究②亚里士多德(前 384 ~ 前 322)—伦理学—研究 IV. ①B222. 05②B502. 233③B82 - 09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53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背景及研究成果	(1)
(一) 两种复兴	(1)
(二) 两种复兴的对话及比较研究	(7)
(三) 思孟学派研究	(10)
二 理论创新及研究方法	(12)
(一)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
(二) 文章特色与创新	(13)
三 主要内容及结构框架	(14)
 第一章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	(17)
一 思孟学派	(17)
(一) 存在形态	(17)
(二) 主要人物	(20)
(三) 主要著作	(22)
(四) 思想特征	(24)
(五) 学术源流	(30)
二 亚里士多德	(32)
(一) 学术成果概要	(32)
(二) 相关论著说明	(33)
 第二章 德性与德性伦理	(35)
一 德性的界定	(35)
(一) 思孟学派论德性	(35)
(二) 亚里士多德论德性	(44)

2 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二	德性伦理	(51)
	(一) 德性伦理	(52)
	(二) 德性与角色	(61)
	(三) 德性与规范	(62)
第三章	人性与德性	(65)
一	人性的界定	(65)
	(一) 界定角度相同	(65)
	(二) 具体内证不同	(68)
	(三) 人性善恶与社会性	(69)
二	人的实现	(72)
	(一) 实现活动	(72)
	(二) 存养与扩充	(74)
三	人性的结构	(75)
	(一) 球体混圆形	(75)
	(二) 锥体级层形	(78)
第四章	具体德目与德性实现	(81)
一	具体德目	(81)
	(一) 主要德性比较	(81)
	(二) 其他德性比较	(108)
	(三) 儒家特有的德性	(115)
	(四) 亚里士多德特有的德性	(116)
	(五) 习俗与礼	(118)
二	德性的实现	(118)
	(一) 仁义内在与仁内义外	(118)
	(二) 德性与德行	(123)
第五章	中庸与中道	(130)
一	中庸	(133)
	(一) 孔子与中庸	(133)
	(二) 子思与中庸	(140)

(三) 孟子与中庸	(155)
二 中道	(162)
(一) 中道思想的来源	(163)
(二) 中道思想的理论基础	(164)
(三) 中道思想	(167)
三 中庸与中道	(173)
(一) 相似性	(174)
(二) 差异性	(177)
第六章 情感与理性	(180)
一 情感与理性共存	(180)
二 情感与理性不可分离	(183)
三 德性实现中的明智与思	(185)
四 德性实现中的志与意愿	(188)
五 欲望、情感与理性	(191)
第七章 快乐与德性	(194)
一 快乐分析	(194)
二 不乐无德	(198)
三 警惕快乐与寡欲	(199)
四 痛苦与忧患	(201)
第八章 外在善与德性	(205)
一 外在不足与自足	(205)
二 必要条件	(210)
三 补充说明	(214)
第九章 最高目的与特色	(217)
一 最高目的	(217)
(一) 至善与天道	(217)
(二) 幸福	(219)
二 主要特色	(221)

4 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一) 整体特色	(221)
(二) 结构特色	(225)
三 特色探源	(227)
第十章 伦理与政治	(229)
一 君子与公民	(229)
(一) 君子	(229)
(二) 公民	(231)
二 宗法王国与民主城邦	(234)
(一) 道德伦常与专业职能	(234)
(二) 仁政与共和制	(236)
(三) 内圣外王与公民教育	(237)
(四) 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	(238)
三 德治与法治	(240)
第十一章 德性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未来走向	(243)
一 德性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主要特性	(243)
(一) 以“德”为本的价值定位	(243)
(二) 利人与利己完美统一的意识形态	(245)
(三) 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	(246)
二 德性伦理学与儒学复兴的价值和意义	(247)
(一) 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背景及意义	(247)
(二) 儒学复兴的背景及意义	(248)
三 德性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未来走向	(249)
(一) 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未来走向	(249)
(二) 儒家伦理学的未来走向	(251)
结语	(255)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73)

导 论

“德性”是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比较热门的术语，在“德性”的光照之下，中西方都产生了德性伦理复兴的浪潮，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将中西的德性之学进行比较；同时，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重要学派，在德性伦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因此，在“德性”的平台上，将中国儒家的重要学派和西方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行比较，就是本书的核心理路。下面将从本书研究背景及成果、理路创新及方法、主要内容及框架结构三个方面做一些基础研究和交代。

一 背景及研究成果

（一）两种复兴

1. 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20世纪后半期，西方伦理学界出现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新伦理学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场复兴运动起源于1958年英国著名学者安思康（Elizabeth Anscombe）发表的《现代道德哲学》。^①在这篇论文中，安思康认为，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将道德当作一种规则去研究，这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停止道德哲学研究。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复兴研究。甘绍平在《当代德性论的命运》一文中指出：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原原本本的回

^① “Modern Moral Philosophy”最早刊于 *Philosophy*, 33 (1985)，再载于 *Virtue Ethics*, eds. Roger Crisp and Michael Slo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归，而是对其理论的吸收和创新，这主要有三种变形：一是以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A. MacIntyre）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的变形；二是以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为代表的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以美国哲学家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为代表的明智论的变形。^①

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是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主要旗帜，他们以反思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面目出现，对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论、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契约论等新旧规范伦理学展开了思想批评，力图恢复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传统，建构现代德性伦理学，其著作《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After Virtue: A Study of Moral Theory*）可以说是现代德性伦理研究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在书中，他审视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批判了道德无序的精神状态，并把道德问题解决的方向指向了传统德性伦理学。而努斯鲍姆认为，德性对于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因而具有普世性，力图消解共同体主义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缺陷；麦克道尔和伽达默尔继承和强化了亚里士多德的“明智”德性，通过对明智的强调来批判和弥补规范伦理学所导致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

此外，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 德洛里奥（Andrew J. Dell'Olio）在其著作《道德自我性的基础：阿奎那论神圣的善及诸美德之间的联系》（*Foundation of Moral Selfhood: Aquinas on Divine Goodness and The Connection of Virtue*）通过考虑上帝在道德自我性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反思有神论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德伦理学的关系，并集中阐释了阿奎那的美德概念。此外，近年来，在德性伦理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和著作，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从道德到德性》（*Morality to Virtue*），英国女哲学家奥罗拉·奥尼尔（Onora O'Neill）的《朝向正义与德性——关于实践理性的总的阐释》（*Towards Justice and Virtue—A Collective Account of Practical Reasoning*），美国学者丹尼尔·斯戴特曼（Daniel Statman）编辑出版的《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德性伦理学。

^① 甘绍平：《当代德性论的命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陈根法的《德性论》就是一部系统研究和阐述德性理论及其实践的专著。该著作对德性的意义和价值,德性的审美力、选择力、意志力、人格力进行了细致探讨,并比较了中西方传统德性伦理,着重论述了德性伦理的当代意义。王国银的《德性伦理研究》也是在德性伦理复兴的学术大背景下结出的果实。该著作分析了德性伦理的概念与结构、中西方德性伦理的发展脉络、德性伦理的本质与方法,以及探讨了在当代社会中德性伦理可能存在的样态,比较综合、全面地研究了与德性伦理学相关的一些问题。此外,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德性伦理的学术论文,如肖群忠的《美德诠释与美德伦理学研究》,陈真的《美德伦理学和道德建设》,李兰芬的《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杨国荣的《道德系统中的德性》等。这些论文对德性伦理的特点、德性伦理研究的内容及德性伦理的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细致探讨,深化了我们对德性伦理学的认识。此外,伦理学界的学理探讨一直围绕着当代中国“道德危机”和“道德重建”等问题展开,很多学者在肯定规范(制度)伦理及其价值的基础上阐释了德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并试图构建新的伦理范式。王海明的专著《新伦理学》、李彬的博士学位论文《走出道德困境——社会转型下的道德建设研究》以及吕耀怀、刘爱龙的学术论文《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就是其中的典范。

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研究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廖申白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黄显中的《公正德性论——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研究》,何良安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了幸福——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周雯的硕士学位论文《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研究》,刘科的硕士学位论文《亚里士多德明智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和论文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实质、特征、学术宗旨及主要德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 儒学的复兴

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国势日衰、民族危亡,西方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文化的先进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在19世纪后半期,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先是天平天国运动中基督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再是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儒学实用价值的补充和

4 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完善；然后是改良派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对儒家思想本体的创新和诠释。虽然这些挑战和革新并没有改变传统儒学的主体地位，但是儒学的完善性和崇高性受到普遍的质疑。随着改良运动的失败和民主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思想界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儒学的彻底批判，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此终结，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受到质疑，甚至遭到完全的否弃。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学者如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等为了挽救民族文化的危亡，站在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回应批判和反批评，重新强调儒家文化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核心地位，是现代新儒学自我发展道路上的起始阶段，也被称为儒学复兴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儒学的复兴和现代新儒学的崛起是同一学术现象的不同表述，前者着眼于对传统的延续，后者着眼于对现代的回答，而此处对于儒学复兴的阐释也选用了现代新儒学的视野。

对于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中有明确的界定，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①。也就是说，由于各自的学术视野、学术气质及学术方法的不同，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内部形态各异，但是，现代性、本体性及重构性是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特征。对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刘述先先生根据新儒家学者的出生年代、学术风格和活动时间，提出了“三代四群”的构架；第一代第一群主要指上述的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及马一浮四位先生；第一代第二群主要有冯友兰、贺麟、方东美等。第一代新儒家基本上都活动在20—40年代，第一群学者的学术风格比较保守，更为强调儒学的本体性和主导性地位，而第二群学者基本上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较深，在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上，往往因对现代性的强调而偏离了儒家文化的本体性、主导性地位，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他们不应当位于新儒家之列。但是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以及方东美的“生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儒家学说本身，是对儒家学说的现代重构，对儒学的复兴和

^① 方克立主编：《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996年版。

现代性转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笔者认为,方克立先生宽泛的态度和上述一代两群的分类法是比较合理的,更能体现现代新儒学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从新中国成立到 80 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氛围和政治气候不适合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儒学传统也随着部分儒家学者迁徙至港台,而在港台落地生根。1958 年 1 月,张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新儒学的成果,在香港的《民主评论》和台湾的《新生》周刊上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应该有存在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宣言影响深远,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第二阶段发展历程中最重大的事件”。该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而儒学特别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哲学的重中之重。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复兴归根到底是儒学的复兴。而且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即认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是充足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应该来源于中国文化本身,即中国需要科学和民主,但是这种科学和民主应该发源和统摄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在儒学复兴的第二阶段发展中,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的会通》,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集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即儒学的特质,阐释了儒学“道德形而上”的特性,重新确立了儒学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系统,并且探讨了“新”儒学的含义及建构,探索儒学新的发展趋向,使新儒学思潮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之一。但是,虽然港台三大家或第二代新儒家在倡导儒学复兴,重新构建新的儒学体系方面贡献甚大,但是他们过分强调了儒学的一本性、主体性、自足性和本源性,在儒学回应现代性时也恢复了其独断性,这就导致了其体系内部的矛盾,为第三代新儒学和儒学复兴的第三阶段提供了路径。

在七八十年代,一批师承港台新儒家而旅居海外的学者,继承了港台新儒学的文化脉络,使儒学研究呈现了新的气象,这批学者不同于第二代新儒家那样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独立地位,不再坚持儒家文化的一本性、自足性和独断性,而是力图在西方文化的多元构架中,为中国文化争

取一席之地。他们坚持开放化、多元化、全球化的学术立场，注重批判意识和对话意识，希望在批判和回应中重建儒学自身。他们不仅注重用西方现代化的视野研究、重构儒学，而且将儒学的重建方向确定在批判“现代性”的道德危机中，注重儒学和谐的人道精神对现代道德的补充和挽救作用，这批学者被称为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有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等。余英时着重阐发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特征，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超现代”价值，注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连接和转化，打破儒学独霸精神领域的构想，注重儒学的人伦日用，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学与传统》等；刘述先主要致力于“理一分殊”的现代诠释，并且提出了现代化的五大弊端，明确标示出儒学的“后现代”价值，主要著作有《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等；成中英意图建立一个更具整合性和开放性的儒学体系，为建立客观性、外向性的儒学开创了道路，主要著作有《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等；杜维明注重儒学的人文价值和对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强调儒学在人文资源和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影响，主要著作有《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等。

由上所述可知，虽然现代性、本体性、重构性是现代新儒学和儒学复兴各个阶段的共同特征，但是在如何回应现代性，如何重建新儒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儒学的本体性、主导性和连续性上，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新儒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一代一群和二代三群的新儒家更加强调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民族主义特色比较明显，而一代二群和三代四群的新儒家更加倾向于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儒学的本体性界定。但是，如果打破民族本位文化和儒家本位文化的界限，将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活动都视为儒家文化的新的发展的话，不仅一代二群和三代四群是现代新儒学的劲旅，而且许多未成体系，还不是很成熟的儒学新研究都可以归入现代新儒学的范畴。这种泛化的取向可能会触动对“现代新儒学”已有的界定，但是学术的发展原本不就是不断地超越和完善吗？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已成趋势的今天，着眼于儒学，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和现代性诠释，本身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此外，在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

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儒学虽然没有得到发展，但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地位，作为一种历史价值被保留下来。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阶级斗争统领了一切领域，学术界、文化界一片荒芜，儒学也受到了彻底的摧残。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思想解放也被提上日程，儒学在劫难后再一次重生，重返学术界，而且在海外新儒学和港台新儒学的影响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儒学第三期”“儒学第四期”的研究热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立文、牟钟鉴、杨国荣、蒋庆、李泽厚等。^①张立文致力于“和合哲学”的现代重建；牟钟鉴试图建立“新仁学”；杨国荣注重存在与价值的关系；蒋庆试图强化儒学的政治功能；而李泽厚则不同意将汉唐儒学排除出儒学发展的进程，因而提出了“四期儒学”说，并且强调儒学的后现代价值。虽然不同的学者群关注的焦点和诠释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儒学的当代价值或者儒学的现代化问题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主题之一。而儒学的复兴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此外，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第四代领导集体非常注重中国的文化建设以及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注重文化的软实力作用。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德治国”思想方针提出之后，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方略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而且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观念，倡导在现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发展和进一步创新，树立对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坚定信念，将民族文化的复兴看作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的文化观念是对学术界文化观的一种回应和总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思想发展的成果结晶。同时，这种文化观也指导和预示着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儒学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学术界和文化界一个普遍的观念，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普遍的关注。

（二）两种复兴的对话及比较研究

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出现了两种复兴：一种是西方德性伦理学的

^① 陈鹏在其著作《现代新儒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将这批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第五群”。此处采用其观点，将这批学者看成是现代新儒学第三代在大陆的发展和延续。

复兴，一种是儒学的复兴，但是这两种复兴都是以单线形式发展的。以德性伦理学模式研读儒学并与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行对话是在 90 年代初才开始兴盛的。就笔者所见，在近 20 年里，中西德性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该书从无立场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分析了幸福和公正问题，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理论优势的当代美德伦理学，是西方德性伦理学与儒家德性伦理学进行对话的有力成果。

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古希腊与先秦儒家德性伦理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余纪元（Jiyuan Yu）先生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s of Virtue*）。该著作虽然题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是其研究内容以孔子为轴心，涉及整个先秦儒学，对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伦理学的性质、人性、道德情感、实践理性、礼仪习俗、最高善和外在于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比较。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野里（Lee H. Yearley）的 *Mencius and Aquinas: 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和勇气概念》）主要比较了孟子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论与“勇气”概念。晁乐红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庸与中道——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主要阐释了先秦诸儒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与中道思想的内涵，并以中庸与中道为主线分析了双方的主要德性及其思想特征。硕士学位论文有陶雅娟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及现代意义》、陈淑珍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思想比较》。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亚里士多德与先秦的中庸思想。钟英战的《人性与德性：孟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比较》主要聚焦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与德性思想；马晓颖的《先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主要概述了先秦与古希腊德性伦理思想的特征。学术论文有戴兆国的《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之比较》、吴先伍的《理性与情感：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伦理思想的差异》、闫周秦的《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美德比较》等。上述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三点：一是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伦理思想比较；二是中西中庸或中道思想比较研究；三是先秦与古希腊整体伦理思想的概括比较研究。

此外，还出现了关于某类德性，如公正与义、仁与友爱、智德与明智等中西德性专题比较研究。如黄克剑的《“正”、“义”与“正义”——

中西人文价值趣求之一辨》，何元国的《孔子的“仁”与亚里士多德“友爱”之比较》，杨适的《“友谊”观念的中西差异》，朱海林的《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智德观的四大差异》等。此类学术论文聚焦于德性伦理的微观研究，注重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来探索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也是中西德性伦理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一。

此外，不同思想体系的相互交流和对话伴随着思想体系本身的成熟与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是比较研究的结果。但是，比较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被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在国内，黄建中先生的《比较伦理学》可谓比较伦理学领域的首起之作。该著作以中西伦理学的比较作为研究基点，阐释了中西伦理学在动机与效果、乐利与幸福、进化与伦理等重要范畴上的异同，并突破了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的伦理学放置在与西方伦理学同等的地位上，探究中国伦理学对一般伦理学的普遍意义，反映了黄建中先生明确的比较哲学研究理路。在国外，中村元先生的《比较思想论》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前比较思想论的成果，并对将来比较思想的发展作了探讨，是比较哲学领域较早和较为系统的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80年代之后，比较哲学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如美国学者列文森（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狄白瑞（Wm. Theodore de Bary）的《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的《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The Way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德国学者鲍吾刚（Wolfgang Bauer）的《中国人的幸福观》（*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中国的思维世界》等。这些著作涵盖面很广，主要是从外部即异域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重要人物、哲学思维、思想现象等，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果。也有运用中国思想反观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总体来说，这些著作都包含着内在的比较思维，即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

的文化传统进行相互对比和反思，探索对于自身而言新的领域或用新的方法反观旧的传统。

此外，国内的比较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上述两种复兴对话的成果就属于比较哲学这一大的研究门类下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在比较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比较方法对相关的思想、现象或人物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属于微观研究的领域。而学术界对比较思想、比较原理和比较方法本身也有宏观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郁振华的《创造——比较哲学的新概念》、谢阳举的《论比较原理与比较思想史》、解青的《什么是比较哲学》、李明辉的《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论省思》、余卫国的《哲学的比较与比较的哲学——关于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集中探讨了比较哲学的概念、原理、方法、目标等理论性问题，对当前的比较哲学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思孟学派研究

另一个与本课题相关的领域是思孟学派研究。思孟学派是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论题之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出土以前，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及疑古思潮的影响，思孟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研究时时处于搁浅的困境之中，但学派内部重要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却蔚为大观，主要集中在子思与《中庸》、孟子与《孟子》的研究上，20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子思与《中庸》、孟子与《孟子》的研究专著已有几百部，相关论文多达几千篇。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以思孟学派为基点，却也为思孟学派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王堆帛书，特别是郭店楚简的出土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养料，也使这一论题成了近十几年来的一大热点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与其相关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如1999年10月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哲学史学会共同主办的“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国际性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针对新出资料的学派归属问题重新思考思孟学派的核心思想，如性与天道、性善论等；提交的相关论文有杨儒宾的《子思学派试探》，程一凡的《性善说的酝酿》，陈来的《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郭店楚简儒书与先秦儒学研究》，李景林的《从郭店楚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兼谈郭店楚简儒家类著作的学派归属问